



# 后哲学文化

〔美〕理查德·罗蒂 著 黄勇 编译

20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Richard Rorty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上海出版基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

# 后哲学文化

〔美〕理查德·罗蒂 著 黄勇 编译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Richard Rorty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哲学文化/(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著;黄勇编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2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

书名原文: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ISBN 978-7-5327-7350-3

I. ①后… II. ①理… ②黄… III. ①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美国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4848号

Richard Rorty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Copyright © 2004 Richard Rorty

本书中文版经理查德·罗蒂本人授权

图字:09-2006-254号

后哲学文化

[美]理查德·罗蒂 著 黄勇 编译

责任编辑/袁雅琴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5 字数 172,000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978-7-5327-7350-3/B·428

定价:8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0-86683980

## 译者序

### 罗蒂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

本书作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现在已被公认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在哲学圈之外,他无疑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同时也一样确定无疑的是,他是当今美国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sup>①</sup>当然,罗蒂的影响超出了美国。这从他的著作被译成大量其他语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sup>②</sup>罗蒂自耶鲁大学毕业以后,曾在韦尔斯利(Wellesley)学院短暂任教,后来到美国分析哲学的重镇普林斯顿大学,一直到1982年。然后跳出哲学系的门槛,到弗吉尼亚大学任凯南人文讲座教授,并从1998起到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而不是哲学系任教。<sup>③</sup>虽然其在哲学界

---

① 在一次访谈中,罗蒂自己也说,“我写的东西对于哲学圈之外的人更有吸引力。这就好像库恩写的东西对于科学圈之外的人更有吸引力一样。我的东西,就同库恩的东西一样,批判先前的哲学家,特别是实证主义者强加于文化的观点。我的许多读者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但他们并不怎么喜欢这样的观点,因此设法摆脱这样的观点。但哲学圈之内的人通常认为我的批判,对于他们毕生在为其寻找答案的问题,太具有危险性了。他们不希望我消解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也就消解了他们的答案”(“分离的世界还是分离的语言?实用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后果:罗蒂访谈”,载《哲学与文学》,卷26,2002年,第370页)。

② 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已经被翻译成16种语言;他的《偶然、反讽与团结》更被翻译成22种语言。他的其他著作也至少被翻译成6种语言。

③ 罗蒂自己回忆说,当初他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向斯坦福大学建议他的教授名称为“潮流研究过渡教授”(Transitory Professor of Trendy Studies)[见其在其《反对老板和寡头》(芝加哥,2002年,第56页)中的访谈]。应该说,罗蒂在(转下页注)

的地位早在其编辑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文集《语言学转折》(芝加哥,1967年)时就已确立了,但他的哲学之特别受到人们重视,是由于其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和人文科学领域引起巨大震动的《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1979年)<sup>①</sup>以及随后所作的一系列讲演和发表的论文。这些讲演和论文中有些已编入《实用主义的后果》(明尼阿波利斯,1982年)、《偶然、反讽与团结》(英国剑桥,198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三卷论文集:《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1991年),《论海德格尔和其他》(1991年),和《真理与进步》(1998年),以及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希望》(1999年)。另外他1997年

(接上页注)离开了普林斯顿以后,是跳出了制度化的哲学,而不是跳出了哲学本身。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的还是哲学,他自那以后所发表的主要也还是哲学作品。他的学生布兰登(Robert Brandom)在其所编《罗蒂及其批评者》(布莱克韦尔,2000年,第ix页)一书的导言中也指出,“使罗蒂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出名的观点还是来自他对英美分析哲学的核心问题(如关于客观实在和真理及对客观实在和真理之认识的本性和意义问题)之独特的哲学思考”。因此事实是,罗蒂在哲学圈内外同样有影响。所不同的只是,其他美国哲学家只是在哲学圈内的人才知道,而罗蒂则超出了这个范围;另外,罗蒂的观点在哲学圈内受到质疑较多(而这显然与其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有关),而在哲学圈外则较受欢迎。

① 关于这本书的发表以及罗蒂同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一事的意义,龙(Berel Long)在1990年曾经指出,“虽然说在1979年的这两个事件以后美国的哲学景观,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实质上,与此之前再也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有点言过其实或者为时过早……但毫无疑问,从1979到1989的10年间美国哲学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罗蒂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个核心人物。”不过罗蒂本人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自己不是这样一个核心人物,而且美国哲学界也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罗蒂清楚地看到,由于其对从柏拉图到当代分析哲学传统的批判,有很多人对他持敌视态度。他说他的观点和他在任主席一年所作的一些决定,使一些分析哲学家对他怀恨在心,永远无法原谅他[见其在其《反对老板和寡头》(芝加哥,2002年,第53—54页)中的访谈]。例如他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虽然已经被翻译成16种国际语言,却被一家保守的英文杂志《(高)校际评论》(Intercollegiate Review,卷35,1999年,第3—13页)评为本世纪最糟糕的50本书之一。罗蒂谈到这些保守派对他的敌视和批判时说,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就好像他们在好好地地下棋,而我却跑过去将他们的棋盘来了个底朝天(见“分离的世界还是分离的语言?实用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后果:罗蒂访谈”,载《哲学与文学》,卷26,2002年,第392页)。

在哈佛大学所作的“维廉·麦西美国文明史系列讲座”也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筑就我们的国家》的书名发表(1998年)。本中文文集由编译者经过同作者仔细讨论,从他自《哲学与自然之镜》以后发表的文章和所作的讲演中挑选汇集而成,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在这里第一次发表。本文集以作者的后哲学文化观为核心。作者更近来的一些论文,特别是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方面的部分文章现在已经编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后形而上学希望》(2003年)一书中。<sup>①</sup>

罗蒂的哲学生涯是在实证主义具有压倒优势的气氛中开始的,而且通过其编辑上述的《语言学转折》和为该书撰写的长篇导言及在同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他自己也曾经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佼佼者。<sup>②</sup>但后来,他却逐渐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了这个运动的批评者。而且事实上,罗蒂所批判的远不只是分析哲学运动,而是一个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寻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如果说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后神学文化的话,那么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

---

① 虽然本书收集的文章基本上都发表于80年代,但还基本上反映他现在的思想。事实上在两年前的一次访谈中,罗蒂自己就说,每当他觉得有些新想法要写的时候,他发现他在20年前就已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了。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也至少反映罗蒂的思想基本上具有一致性(见“分离的世界还是分离的语言?实用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后果:罗蒂访谈”,载《哲学与文学》,卷26,2002年,第384页)。当然罗蒂在说上面这样的话时,他主要想表明的是自己思想的一致性,而是以其特有的自谦表示自己缺乏像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创造力,因此无法提出两套很不相同的看法。事实上,他的思想在这30多年来还是有不少的发展。

② 后来,罗蒂自己提到,他的分析哲学功夫主要不是他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时建立起来的。在他看来,耶鲁当初还处于“前分析哲学”时期。但由于分析哲学在当初几乎成了美国哲学的通用语言,他在耶鲁毕业后在韦斯里学院任教的3年中恶补分析哲学的课,以便可以与其同事具有共同语言。这使他不久就可以开始写有关分析哲学方面的文章了(见其《反对老板和寡头》,芝加哥,2002年,第52页)。

超越将会导致一个后哲学文化。在这样一个后哲学文化中,将不再有人对这种绝对实在和这种绝对实在的表象感兴趣。而在罗蒂看来,在促成这样一种文化的到来方面,实用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实用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而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罗蒂把人们一直以为是在唱对台戏的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本土哲学结合起来了:尼采与詹姆斯、海德格尔与杜威、德里达与戴维森,等等。也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与反表象主义的意义上,罗蒂没有完全否认分析哲学。因为正如他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这个运动由于其内在的辩证过程,正在越来越偏离其出发点,发展出了一种与柏拉图主义相反的东西。

因此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是罗蒂的一个基本概念。在下面几节中,我将首先分析罗蒂实用主义思想产生的背景,即今日美国新实用主义思潮的兴起,然后阐述罗蒂实用主义的几个基本思想,其后哲学文化概念的内在隐含,最后讨论他对自己这种观点的一种自我维护:种族中心主义。

## 一、今日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兴起

毫无疑问,从皮尔士开始至杜威达到顶峰的美国实用主义已经成了美国文化的哲学。事实上,美国哲学通常是与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连海德格尔也注意到,美国人对美国精神的解释是实用主义。<sup>①</sup>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发现,从其产生之日起,实用主义就从来没有在美国取得过支配地位。即使在其鼎盛之日,老式的唯心主义和新式的自然主义也一直垄

① 海德格尔:《有关技术的问题和其他论文》(纽约,1977年),第153页。

断着各主要大学的哲学系。但无论如何,在此期间,实用主义还是很有活力的哲学派别。而在杜威死后,实用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立场还被保存着,但很少有美国人会为此而感到骄傲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大多数追随者不再是有影响的专业哲学家。而专业哲学家们则在实用主义对符合论真理观的拒绝中看到了其相对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隐含而转向别的哲学立场。

实用主义在杜威以后的式微,首先是因为实用主义强烈地反对哲学的专业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正是哲学的专业化时期。这个时候,哲学家们不是把自己的专业与神学相联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也不是与社会科学联系(像实用主义的鼎盛期那样),而是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相联系。总之,人们认为哲学应当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这就使实用主义很难完全进入学术界。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由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倡导的在符号逻辑中的革命和对符号逻辑的入迷使专业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实用主义未曾讨论过的问题。因为除了皮尔士,经典实用主义者们主要关心的不是理论构造而是实际行为,不是形成一般的原则完成神圣使命,而是运用独特理智解决社会问题。当然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为逃避纳粹迫害,欧洲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哲学家,如卡尔纳普、赖辛巴赫、塔斯基和亨普尔等,纷纷移居美国,从而也把一种纯粹、严格和精确的精神带进了美国哲学舞台。很快地,逻辑实证主义便牢牢地控制了美国主要大学的哲学系,并支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想象力,而实用主义在他们眼里成了模糊的头脑不清的哲学。<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衰,见韦斯特(Cornel West)的《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的谱系》(麦迪逊,1989年)。

但在最近,实用主义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虽然这还不能与其从皮尔士到杜威的鼎盛期相比,更不能说支配了美国哲学界,但它确实不像在逻辑实证主义占有压倒优势时那么默默无闻甚至成为否定性的东西。这种复兴的一个迹象是,许多今日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往往不那么犹豫地乐于接受人们称其为实用主义者,即使他们自己也许还是更情愿被称为别的什么主义,而且即使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可能与实用主义还有一段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并不十分惊人却也绝对不容忽视的实用主义复兴并不限于哲学界。像伦特里希(Frank Lentricchia)和菲什(Stanley Fish)这样的实用主义文学批评家使传统的人道主义者感到了不安,像沃尔泽(Michael Walzer)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家,则由于提出了更激进的政治思想而使传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受到了挑战;而像斯托特(Jeffrey Stout)和考夫曼(Gordon Kaufman)这样的实用主义神学家则正在改变流行的宗教观念。<sup>①</sup>

我们再把视野收回到哲学的实用主义上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的复兴,或者说新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走到了尽头。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许多传统哲学问题的虚假性。但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了。“哲学家们想做些新的事情。通常,在其启示的源泉干枯的时候,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总是面向欧

---

① 另外,实用主义也在其他一些领域产生了影响。例如韦斯特提出了“先知式的实用主义”;西格弗里德(Haddock Seigfried)和斯科特(Joan Scott)则提出了“实用主义女性主义”;而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森斯坦(Cass Sunstein)则提出了“实用主义的法律理论”[见克洛彭伯格(James T. Kloppenberg)之“实用主义:老思维方式的新名词?”载佩特格鲁(John Pettegrew)编《实用主义的进步? 罗蒂与美国思想史》(拉纳姆,2000年,第40—44页)]。

洲大陆,寻找新的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的。”<sup>①</sup>例如,在哈贝马斯和福柯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发现了对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数学和科学问题的关心,而在像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看到了哲学与小说、电影和戏剧等的关系。而这些正是杜威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预计会在美国出现而实际上没能出现的:“如果我对时代的征兆理解不错的话,当社会科学和艺术的重要性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就像数学和自然科学在过去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那样)的时候,在其全部的意义得到把握的时候,一场新的整合运动将在哲学中出现。”<sup>②</sup>另一方面,在所有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他们也都看到了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实在论和表象论的反动,而这也正是美国经典实用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因此,今日美国实用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企图把美国哲学与大陆哲学在实用主义的主题下联合起来,如像伯恩斯坦和罗蒂所做的。这些人往往比较注重社会政治问题。<sup>③</sup>另一是用实用主义的灵感改造分析哲学,使之摆脱实证主义的穷途末路。如像戴维森和普特南所做的。这些人虽然主要关心的还是思想与语言,但如罗蒂在本文中文集的导言中所指出的,就其并没有赋予自然科学任何特殊地位而言,已与实证主义根本不同了。

毫无疑问,在使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舞台上起死回生方面,

---

① 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明尼阿波利斯,1982年),第76页。

② 杜威:“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载伯恩斯坦编:《杜威论经验、自然和自由》(纽约,1980年),第18页。

③ 在这种意义上,有人甚至认为,实用主义已经不再是为美国所特有的哲学了。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可以说,像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实际上提出了与实用主义一致的观点,而且还因为像哈贝马斯和阿佩尔(Karl-Otto Apel)这样的人更自觉地、有意识地从实用主义的思考。参见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为实用主义加油:20世纪末的美国哲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蒯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这主要不是由于其与实用主义的谱系关系:1931年他聆听了杜威在哈佛所作的第一个詹姆斯讲座,而在196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第一个杜威讲座。这更主要地是由于他对实用主义的实际贡献,并使人们重新对实用主义哲学产生兴趣。蒯因在杜威去世前一年半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被认为“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论文”。<sup>①</sup>而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蒯因重新举起了实用主义的大旗。逻辑实证主义一方面坚持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的区分,另一方面又相信所有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还原为经验命题。经验主义的这两个教条都服务于其想为科学与形而上学分界的目的。“在拒绝这样的界线的时候,我倡导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每一个人都被赋予科学的传统和一系列连续的感觉刺激。指导他使科学传统与其连续的感官刺激适合的各种考虑,只要是理性的,就是实用主义的。”<sup>②</sup>

但蒯因对实用主义的更系统阐述是其“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一文。蒯因认为,在后休谟的经验主义中有五个方面与经典实用主义直接相关。第一是方法论的唯名论。根据这种理论,在认识论中,要尽可能地讨论语言表达而不是观念;第二是本体论的脉络主义。它主张,要想得益于一个方便的、但本体论上带来麻烦的术语而又否定其指称,我们必须依赖于脉络定义。第三是认识论的整体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相当广泛的科学理论整体,而不是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语词,才可以成为表达意义的单位。第四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即蒯因在“两个教条”中所

① 多那根:“评爱德华编《哲学百科全书》”,载《哲学评论》,1970年1月号,第91页。

② 蒯因:“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载《从逻辑的观点看》(纽约,1983年),第46页。

强调的要放弃分析-综合的二元论。最后是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放弃先于科学的第一哲学的目标。蒯因认为，这最后一点，对于实用主义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尽管依旧奉行“我”的自然主义但其中的我却走到了实用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我必须承认，科学理论的系统结构是人造的。是的，它是用来适合感性材料的，但它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因为它并不是完全由材料决定的。所有别材料，所有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系统，也都可以与这个材料相适合。”<sup>①</sup>

蒯因最重要的追随者、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戴维森恐怕是一个最有影响（至少在罗蒂看来）但又不愿被称为实用主义者的实用主义者。其主要著作《真理与解释研究》就是献给蒯因的，并说“没有他就没有本书”。他在1989年作了“哥伦比亚大学第六次杜威系列讲座”（蒯因本人于1968年作了第一个杜威系列讲座）。开讲第一句话也许说明为什么人们要把他看作是实用主义者；“如果没有可以思想的存在物，世界

---

① “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载麦万尼编，《实用主义的起源及其展望》（南加州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8页。蒯因无疑是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源泉，不过蒯因并不同意罗蒂对其思想的解释。在其所写的关于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的一篇文章中，蒯因指出，当一个哲学家听到其同事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肯定的陈述时，这个哲学家当然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他发现这个同事对自己观点之非常肯定的陈述有错误时，这个哲学家就会感到很遗憾，因为他如果指出这个同事陈述的不是自己的本意时，他的同事可能就不会这么肯定他的观点了。具体地说，罗蒂在其《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概括了蒯因的五个论点。其中的第二个是，除了帮助我们对付感觉信号以外，句子没有任何独特的认识论地位（见该书英文版，第202页）。对此，蒯因并不赞同。他说，“我并不认为，认识之惟一或者主要的目标是对付感觉材料……对于我们来说，认识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理智的好奇……我关于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异议与观察句子有关，这样的句子确实有‘独特的认识论地位’，它们与感官刺激直接对应，因而把理论与外在实在相联系”（蒯因，“让我强调肯定的方面”，载马瓦霍夫斯基（Alan Malachowski）编《读罗蒂：对〈哲学与自然之镜〉的批判回应及其他》，布莱克韦尔，1990年，第119页）。

上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任何对象或事件,可以是真的或假的。”<sup>①</sup>也许戴维森对实用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在蒯因拒斥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以后,诊断出了经验主义的第三个而且在他看来是最后一个教条(因为在抛弃了这样一个教条以后,在他看来,似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为经验主义所特有的了)。这就是他所谓模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康德的先天范畴和后天经验就是这种二元论的一个例子。而实证主义的意义与信念之区分又是这个教条的另一个例子。在这种二元论中,模式通常被认为是独立于内容的,因而不会因内容的改变而改变。而在戴维森看来,模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因为它们是相互依赖的。例如“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源于解释语言行为的这样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赋句子以信念和解释句子……显然我们必须有一个同时能够说明对待语言的态度和解释语言的理论,而这个理论本身并不假定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sup>②</sup>

戴维森理论中与实用主义有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在真理问题上的“没有对质的符合论”。戴维森反对传统的符合论的真理观,因为这种理论认为真理需要与外在世界对质,而这种对质在戴维森看来是荒唐的。事实上,戴维森持的是一种与传统符合论相反的融贯论。他的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就是“关于真理和认识的融贯论”。只是他认为,支持这种融贯论的根据不但不排斥符合论,而且会产生符合论。因为“纯粹的融贯不能保证一个人相信的东西,”<sup>③</sup>这里还需要符合。当然外在世界不能作为一个立场使信念与之符合。但还是有信念可以与之符合

① 戴维森:“真理的结构和内容”,载《哲学杂志》,1990年6月号,第279页。

② 戴维森:《真理与解释研究》(牛津,1985年),第195页。

③ 戴维森:“真理与认识的融贯论”,载亨利希编:《康德还是黑格尔》(斯图加特,1983年),第424页。

的立场。这就是彻底的解释者的立场(类似蒯因的彻底的翻译者)。“关于其什么时候同意句子,即什么时候认为这些句子为真,说话者不能系统地蒙骗其可能的解释者;因此原则上,意义及信念(就其与意义有关而言)都受到公众决定。”显然,戴维森的这种关于真理的、没有对质的符合或产生符合的融贯说,从根本上说,与罗蒂和哈贝马斯的对话共同体理论是一致的。可能正因为这样,戴维森承认,在1983年底美国哲学年会太平洋地区分会上,罗蒂成功地说服了他不再用符合论或融贯论来称呼自己的理论。据说作为回报,他也成功地说服了罗蒂放弃其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他还承认自己以前所运用的符合和融贯具有令人误解之处。<sup>①</sup>

与上面两位哲学家不同,原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普特南则在近来越来越乐意被称为实用主义者。在其《带有人面的实在论》一书的导言中,他说,他现在认识到,他以前(甚至一直到现在为止)笨拙地在实在论名义下从事的研究如果是在实用主义的名义下进行也许会要好得多。普特南在此提到的这种研究是指他最初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阐述的与形而上学实在论或外在论实在论相反的内在论实在论,或者说与来自上帝的观点的实在论相反的来自白人的观点的实在论。根据前一种实在论,世界由独立于心灵的东西组成。对于世界的实际样子,可以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完整的描述。真理是语词或思想或符号与外在世界的符合。这是一种上帝的观点,因为只有上帝,一个超然于人和世界之外的超越存在物,才可以作这样一种比较,

---

① 见戴维森为自己的“真理论和认识的融贯论”所写的“后记”,载马瓦霍夫斯基编:《读罗蒂:对〈哲学与自然之镜〉的批判回应及其他》,布莱克韦尔,1990年。第134—137页)。在这篇后记中,戴维森实际上表示,他与罗蒂完全一致。并说,如果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分歧的话,那么一定是在非常枝节的问题上。

才知道是否有此符合。但我们是人,而不是上帝,因此只有资格提出一种内在论实在论。根据这样一种实在论,“只要对象与怎样使用符号和如何使用符号没有关系,符号就并不必然地与对象符合。但实际上由特定使用共同体以特定方式使用的符号确实与在这些使用者的概念模式之内的对象符合。‘对象’并不独立于概念模式而存在。当我们引进某种描述模式时,我们就把世界划分成对象。由于对象和符号同样内在于描述模式,就有可能说什么与什么相匹配。”<sup>①</sup>

虽然在《理性、真理与历史》这部著作中,普特南还认为,曾被用来称呼这种内在实在论的“实用主义”,同“融贯真理论”“非实在论”“证实论”“多元论”等标签一样,由于其历史上的其他用法,具有不能令人接受的隐含,但后来,他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种实在论应当更恰当地称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因为一方面,这种实在论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认识也不能有效地使用上帝的观点。所存在的只是我们实际的人的各种不同观点,而我们这些实际的人所考虑的是我们的描述和理论为之服务的各种利益和目的。另一方面,实用主义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坚持行动者的观点之至高无上性。如果我们发现,在从事广义的实践活动时,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观点,使用某个‘概念系统’,那么我们必须同时进一步主张,这实际上不是事物本身的样子”<sup>②</sup>。这样,他便发现,实用主义可以更好地表达这种实在论观点。<sup>③</sup>

①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剑桥,1981年),第62页。

② 普特南:《多面实在论》(拉萨勒,1987年),第17页。

③ 在罗蒂自己看来,普特南,同戴维森一样,实际上持与他完全相同的看法。他说,“他们之所以要与我疏远,如果他们真的想与我疏远的话,主要是因为,在我发表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以后,人们都把我看作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分析(转下页注)

一个更为自觉的实用主义者是曾任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的理查德·伯恩斯坦。他的一个重要论文集子《哲学面面观》的一个副标题就是“带有实用主义语调的论文”。伯恩斯坦本人的兴趣是要发展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在他看来,实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广义上是指一般的生命活动,而在狭义上是指自由人的生活方式,指的是支配着人的伦理和政治生活的学科和活动,指的是在城邦中的自由活动和有关这些活动的学科。伯恩斯坦虽然试图把这两种不同的意义结合起来,但他显然更关心狭义的实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认识到了实用主义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充满了自由精神:这里“有一个明确的命令:决不能封闭研究道路,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任何信仰,不管多么心爱、多么根本,都容许(而且事实上也要求)进一步的批评”。<sup>①</sup>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区别。伯恩斯坦所关心的主要不是语言的意义和真理问题,而是伦理政治生活的自由问题。置身于实用主义复兴运动这个广阔的视野,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区别。伯恩斯坦所做的主要不是用实用主义重建今日美国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而是企图发现美国哲学与大陆哲学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在他看来就是实用主义。例如,他认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几乎可以发现实用主义的所有主要论点:对近代主观主义

---

(接上页注)哲学的敌人,而他们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制度的敌人。他们并不想给人家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们也加入了我的行列来全盘批判美国的学术哲学。在我看来,无论是在我与戴维森之间还是在我与普特南之间,很难发现在哲学观点上的任何实质差别。每次在我想就我与他们的差别写些什么东西时,这些差别就消失了”(“分离的世界还是分离的语言?实用主义对文学研究的后果:罗蒂访谈”,载《哲学与文学》,卷26,2002年,第392页)。关于戴维森与罗蒂哲学的关系,可以参见莱特森(Ben H. Letson)的《戴维森的真理论及其对罗蒂实用主义的意义》(彼得朗,1997年)。

① 伯恩斯坦:《实践与行为》(伦敦,1972年),第314页。

和基础主义的批判;对二元论的怀疑和解构;对“偏见”的翻案;对人的历史性的强调,等等。<sup>①</sup>他也认为,虽然加达默尔可能继承了海德格尔对美国实用主义的轻蔑,他对实践智慧的强调,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克服,对人类有限性的意义、所有理解的可错性和经验向未来的开放性的重视,都使他实际上与美国实用主义很接近。而哈贝马斯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自觉的实用主义者,因为他的思想有不少得益于其对皮尔士、杜威和米德的研究。因此在他的交流行为理论中发现不少实用主义的回声就不足为奇了。<sup>②</sup>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新实用主义兴起的背景中,我们才可以理解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文化观。

## 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

在这场实用主义的复兴运动中,罗蒂无疑是一个最自觉、最有影响的哲学家。<sup>③</sup>阅读今日美国的哲学文献就会发现,没有一

① 伯恩斯坦:《哲学面面观》(牛津,1986年),第200—201页。

② 由于其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他对罗蒂最近二三十年来所发表的东西更感兴趣,这不仅因为在这些作品中,社会政治问题也是罗蒂关心的一个重点,而且也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政治上的左派。不过在其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伯恩斯坦对罗蒂还是有所抱怨。罗蒂一直反对抽象的社会政治哲学而强调改造社会的具体行动,但伯恩斯坦认为,一方面罗蒂没有告诉我们现在到底应该从事哪些活动(见其“罗蒂鼓舞人心的自由主义,”载吉尼翁(Charles Guignon)编《罗蒂》,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而另一方面,在伯恩斯坦看来,虽然基础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哲学应当拒绝,但改造社会的具体行动还是需要理论指导,而且除了基础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外毕竟还有许多其他政治哲学(同上书,第136页)。

③ 马戈利斯则认为还要加上普特南。他说,“如果在讨论实在主义、相对主义、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公共和私人的责任与价值等专业问题时,罗蒂和普特南不将自己称为实用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很难想象今天有实用主义的复兴”(《为实用主义加油》,第136页)。